

论教育伦理价值与高校治理

郭增琦 类延村

(西南政法大学 学工部 重庆 401120)

摘要: 价值成为相关主体坚守的理念便上升为伦理层次, 价值通过人作为中介产生能动影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普及和其公益性遭受质疑的当下, 治理理论必然成为高校管理的运作原则。在探讨大学精神内涵的基础上, 以高校相关利益主体的价值秉持为视角, 构筑科学的治理模式, 以促成多元利益的协调与实现, 高校自然实现自身发展和社会效能的双重效果。

关键词: 大学精神; 教育伦理价值; 治理主体; 内外规范

一、大学精神、教育伦理价值与内涵延展

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淀, 是大学保持生命力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属于应然的范畴。应然是种与现实的比照, 大学精神理应是高校发展追求的境界和指导。大学精神的内涵拓展过程中, 在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独立、民主、自由等要素为核心的构成, 其目标旨向终于公共性的实现。

独立是大学作为能动主体在地位上的一种努力, 即大学的运作主要由法律的规范, 不受无端的干预, 主要体现为以学术自由为旨向的自主决策权的行使。社会与政府的影响不是强制性的命令, 仅是对大学保持公共性的外在规束, 或是干预成为一种决策的参考, 而绝不会形成对大学运作的宰制, 大学依据学术主体的主张进行自治, 自主地处理大学内部事务。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而言, 大学制度的基础是政府控制。大学应然具有的多样性特征, 通过规范、模式、资源限制等中介亦形成同一化的形式, 教育本质蕴含的个体实现的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政府和高校的协同机制和路径成为必需思虑的问题。

民主是大学的间接努力和自觉追求, 通过理念的传输和正外部效应予以实现。大学是社会良知和先进文化的发现者和弘扬者, 是社会公众获取知识和塑造自我管理能力的根本路径, 亦属教育本质的应然范畴。除却职责的功能之外, 凭借的正外部性同样促进民主精神的生成与作用。

自由是大学精神产生的根基, 主要涉及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个体域内活动自由等向度。在高校内部运作中, 自由的终极在于通过学术自由的实现塑造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行为的个体。学术自由的核心在于保

护知识的研究与传播, 其合理性是由高深学问性质所决定。这种自由以责任承担为主线, 通过学者使命促进社会价值, 进而引导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是自由的价值追求, 亦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大学精神亦或教育价值的旨向公共性的实现, 需要经过两重回归的过程: 一是意念的范畴, 即主体的价值塑造与延续; 一是行为的范畴, 即不同个体构成的自我实现。前者是价值存在向价值认同的过渡, 后者实质指出个体还原的可操作性是公共性的有效性前提。

大学精神和教育价值过渡到伦理价值体现更多的是主观层次的理论前提, 目标在于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 其效果的双重性亦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柏拉图曾正言, “教育已被证明是一个吸引的过程, 即引导儿童们接受正确的原则的过程”。由此可见, 正确的原则是高校等主体追求的应然伦理价值。

向善是人性的内在需求, 表现为对他人和社会有意义存在, 教育内容、教育过程和教育功能在本质上设计应然的体现“良性”品质。教育内容本身具有容纳性的特点, 学科和知识内涵是多元构成, 有机的整体组合会促进本域内的递进和创新的实现, 个体通过对知识的接纳奠定认知和感悟“善”的前提, 知识积累和广袤与对“善”的把握娴熟度在常态下是正相关的关系。教育过程的兼进性将个体的特征纳入教育的范畴, 全面教育和细节性教育促使人的向善伦理价值的实现。道德知识的传授不能诠释伦理价值的现实意义, 实践性的道德品质塑造则是“善性”实现的重要路径。

功利主义学者边沁主张, 苦与乐统治世界, 人应追求最大的幸福。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实现与自我实现的结合。幸福的达成不仅仅波及个体的发展, 实

收稿日期: 2009-08-21

作者简介: 郭增琦(1965—), 男, 汉族, 山东蒙阴人, 副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学工部长兼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

质是对共同体的推进。柏拉图认为,教育应该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公民的渴望。这种完善体现为实现的满足感,是伦理价值的向度和范畴。教育的功能是多维度的,其发展性、享用性的功能是人的自由和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不以伤害他者为原则的个体幸福生成的是和谐的状态,幸福的延展性和延续性使得幸福的主体范畴扩展为高校内部主体和外部相关主体的组成,即主体间性的问题。领域的扩大实质是个体到公共的回归,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公共性之间形成循环和双重回归。理论的描述转化为现实则需要外在规束和机制的保障,是对相关者互动关系的引导,在角色合理归位下的利益协调。由此,大学伦理价值与治理之间产生关联。

二、高校治理的可行性与高校运作现状

治理理论起源于公司治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家和信息经济学家对企业领域的产权状态与决策结构间的关系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早期企业制度建立在所有与经营者信息不分离的基础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信息对称,决策结构明了;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的是法人公司制模式,建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信息不对称,存在代理风险,由此产生了复杂多方位的决策结构,即“企业治理结构”。

后来此种管理模式逐步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给出治理定义,将其定义为“是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治理的核心前提“冲突和多元利益”及“契约关系”的存在。高校治理正是这些思想、方法、理论等引入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管理学家的研究对高校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共识,公立高校两权分离的基本实现为治理理论在高校的运用奠定了必要前提。

治理理论的实现要注重适用性,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与作为私有部门的企业间存在先天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结构和社会属性的不同。高校社会构成的广泛性决定了治理过程中决策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企业的治理过程中,按股份确定具有决策权的股东构成,追逐利益的本性促成决策权力主体的单一化和唯一性。高校委托代理关系在渊源上最终追溯到公民的授权,高校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以公民的发展为目标,处于直接委托主体地位的政府亦表明了治理的公共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自然决定了两者连同高校及高校内部主体决策权力主体的地位。高校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目标取向。高校的受益人是社会公众,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高校治理的目标是自身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层次。

高校治理结构的功能在于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关系,改变“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构筑多种主体间的一种协同与合作。治理结构的实质是“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这就涉及对利益相关者的甄别和界定,以及对治理机制的寻求和塑造。依据看待问题的逻辑性,明辨高校现行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是高校治理模式塑造有效的前提。

(一) 国家教育体制发展的滞后

高等教育体制一般由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资源获取体制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由垄断走向多元,出现公立与私立之分,在管理上高校的法人地位得以实现,高校发展呈现独立和自主的倾向。总体而言,这种趋势依然需要改进和加强,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体制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明显泛行政化特点。高校间的行政等级化现象比较严重,与政治资源、政府关系的关联程度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空间关系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发展。高校主要管理主体的层次与高校的行政级别与资源获取呈现一致性,办学权力和管理权力集中于教育行政部分,资源分配的话语权被其垄断,资源的多寡依科层而定。特别是“211”院校、“985”工程实施,将有限资源和教育投入集中到少数学校。大多数学校由于资源的困厄发展越来越慢,少数学校则借助资源的优势进行整体的超越。

(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市场化倾向严重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旨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的实现,受益规模的扩大和受益质量的提高是主要的途径,是改革主导者政府的责任。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而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等同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已成为众多相关者的“错误共识”。这种观念的普遍践行实质是通过改革卸责的体现,将政府的职责分解为高校和社会公众的负担。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的多元化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学生受益规模的急剧增加与教育投入的增长滞后形成明显对比。高等教育运行成本在政府责任之外的找寻,使得家庭成为必然的付费者,慈善团体、企业则是或然的参与者。家庭的义务性或强制性承担是对公民应然话语权的剥夺,高等教育改革主导者话语权的绝对性缺乏合法性的前提。

(三) 高校行政学术化日益普遍

高校行政学术化是近期部分学者倡导的一种教育改革取向,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管理人员学者化、管理工作科学化、管理为学术服务。这种探索在外在约束匮乏或无力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相关人员的内在道德、品性的差异则容易造就教授间的分化,学术主体

的平等性就遭遇侵蚀,是高校内部不同域场间宰制的体现。

三、教育伦理价值与高校治理模式塑造

价值观良性延续的自觉是行为的先导,解决行为和机制的问题要以规范的理论体系和主观的善性向度为先导。如前文所述,教育伦理价值的形成关键在于个体品质的塑造而非知识的形式传输,高校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自觉,自觉本身即是价值取向的体现。高校和政府的行为动力源于其应然的职责和对利益得失的测度,个体的动力则更显现为一种本能。

政府和高校在广义上同属高等教育运作主导者的范畴,具有话语的强势,制度造就的行为惯性偏重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改革带来的利益得失比重是其行为抉择的决定性要素。同时,公民及相关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权力观民主层次上追溯的取向,促使政府将维护职责的合法性必然纳入不断更新维护的任务之中。在个体而言,其行为是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手段,自我实现和自我欲求的凝聚是规律性的,个体会最终成为教育伦理价值的形成渊源和前提。

治理模式是对各个主体地位和意愿的尊重,是决策权力在主体间的合理分配,体现为战略利益攸关者主导作用的发挥和一般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就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而言,上文相关主体的行为自觉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取决于强势主体对权力的自我让渡——宏观层次是政府对高校和社会的善意回应,微观角度是高校权力在高校内外部主体间的科学划分。

作为公共权力构成的公共教育权力,应该具有这样几个内涵:从主体看,从属于公众而非个人;从个体看,指向公共事务;从功能看,为公共利益服务。因此,以良好的伦理价值为出发点,消解国家或政府在公共教育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是实现大学治理的重要途径。

(一) 在国家和政府层次,要增强教育规范制定的民主性,构筑科学的规范制定机制

尊重各方的利益和需求,以个体和团体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增大各方在规范制定上的话语权,避免单一规范制定主体的利益倾向对其他主体的宰制。具体而言,各级教育规范的起草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成员构成要反映各战略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完善立法体制和立法人员的确认机制,这是规范效力存在与否的合法性前提。

(二) 在高等教育的运作层面,引进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建立竞争机制

政府运作的公益性特点不能遮蔽自身失灵,资源配置的优化依赖于公共渠道和私有渠道的结合。市场化不等同于付费,强调的是竞争机制的引入,基于公平

和效率的原则破除政府垄断运作的低效能。当前运行较好的是办学机制的多元化和高等教育所需服务提供的多元化,机制运行成本的承担基于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本质依然是政府的责任,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不能成为政府规避职责的借口。

(三) 就高校自身而言,要建立高校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促进高校的全面和谐发展

在高校自身运作中,高校教师、学生、社会中介、家长和行政体等是其相关利益者构成,涉及内部运作和与外界的联系,其发展机制明显要涵盖内外两个维度。在高校内部运作中,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减弱泛行政化的特点,增强学生的自主管理,实现教授自治与党政管理的有效契合。建立学生自治机构,尊重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和需求。在学校内部决策中,将作为学术主体基本构成的教授纳入其中,增强其在学术事务方面的决策权,这亦是知识专业性的使然。高校内部的民主性存在内部倾向的特点,社会主体的适当参与是对高校运行理性的矫正。建立相关机构,为外部话语的引入创造途径和条件是高校治理实现的重要举措。

治理理论已成为管理学界和实践领域倡导的指导原则,通过上文的阐述,基本理清了我国高校实现治理的路径。基于我国高校特性和改革的迫切性,良性教育伦理价值的秉持是治理模式构造的前提。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进行甄别,进而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成为高校治理实现的逻辑脉络。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 名牌大学与中国改革——以清华大学为例[J]. 清华大学学报, 2009 (01).
- [2] 柏拉图著, 张智仁, 何勤华译. 法律篇[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3]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 [4] 龚怡祖.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真实命题与中国语境[J]. 公共管理学报, 2008 (04).
- [5] 李承宗, 谢翠蓉, 江辉. 论教育的伦理价值[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8 (11).
- [6] 程建军. 科学行政发展观引领下的高校行政学术化[J]. 江海学刊, 2008 (04).
- [7] 殷伟群, 戴烽. 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05).
- [8]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 [9] 刘淑华. 教育分权内涵再探[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 (11).
- [10] 张志远. 解读大学精神[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9 (05).